

网络时代的劳工研究与文化研究： 《学做工》的今日再思

郑彪

摘要

社会转型促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并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网络社会也在中国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文化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也成为值得思考的议题，将文化研究与劳工研究相结合的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则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充足的理论资源。面对地域转换与时代差异，本文结合“杀马特”文化，从研究对象的转变；媒介、研究空间、研究方法的转型等方面探讨对《学做工》理论进行继承与突破的可能。

关键词

社会转型、网络时代、《学做工》、劳工研究、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郑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邮箱：zhengbiao1031@gmail.com；北京大学“中正舆情基金”。

Working-classes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Networked Age: Today's Reflections on Learning to Labour

Zheng Biao

Abstract

The new working-class in China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ce. In the meantime, China witnesse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ed society.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Internet cultural production of new working-class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have become essential issues. Learning to Labour by Paul Willis which combined cultural studies and working-class studies provides us with abunda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on these issues. Facing with the changes of location and era,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Smarts,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possibility of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s of *Learning to Labour*'s theor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ransition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text.

Key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tworked Age, *Learning to Labour*, Working-class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Authors

Zheng Bia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zhengbiao1031@gmail.com; Zhongzheng Public Sentiment Funding.

一、导言

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刻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也生产着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沈原,2006)。由乡入城的农民工群体是新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生于1980年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成为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¹

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网络社会的崛起。自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始,互联网就开始了飞速发展;网络深刻影响甚至重构着中国的意见表达(胡泳,2008)、政治话语(Meng, 2011)、社会运动与文化塑造(杨国斌,2012)等多个方面。进入21世纪,互联网进一步普及,农村地区和社会底层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大大提高。²互联网不再是社会中上层的专享;新生代农民工也开始接触互联网,成为网民群体的一员。互联网已经成为他们沟通媒介和文化创造的重要工具(Peng, 2008;周葆华,吕舒宁,2011)。

那么,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之下,新工人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创造有了怎样的新的特征;他们的文化创造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都成为值得思考的议题。1977年出版的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³作为文化研究和劳工研究的经典之作,就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在国内学界已有的对《学做工》的相关探究中,主要聚焦于对其理论的阐释(吕鹏,2006;李婷婷,2007),以及农民工子弟与学做工中的“小子们”的比较研究(熊春文,史晓晰,王毅,2013;周潇,2011)。这些探究都体现了《学做工》的理论在当代中国强大的适用性。然而,《学做工》同时亦是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到了《学做工》在劳工研究方面的启示,但没有突出《学做工》在文化研究方面的价值。在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中国的文化图景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些研究忽略了《学做工》在新的语境,尤其是网络社会崛起的背景之下应用问题的思考。

本文意在发掘和探讨《学做工》在网络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及其对当代中国劳工研究的启示。本文将首先从《学做工》出发,概述本书的基本理论脉络,揭示其

理论意义；在第二部分，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出现的杀马特文化，从研究对象转变与媒介与研究空间的重构等方面对《学做工》理论的继承与再思进行探讨。

二、《学做工》——文化抵抗与社会再生产

形形色色、惊世骇俗的青年亚文化的出现 (Hall, Jefferson, 2006)成为二战后英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些“离经叛道”的群体，在引发媒体和公众的恐慌的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的征候（manifestation）。在这样背景之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对青年亚文化进行了深入探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伯明翰学派”。青年群体的亚文化创造具有怎样的意义，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与时代变迁有着怎样的关联，则成为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通过对工人阶级子弟“小子们”反学校文化的细致描绘，窥见了这一群体的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之间的关联，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学做工》的论述发轫于这样的问题之上：英国工人阶级子弟为何选择继承父业。在保罗·威利斯看来，工人阶级子弟选择体力劳动，并非来自于社会和制度的压迫，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需要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子弟“自甘如此”。因此，保罗·威利斯将眼光放在了汉默镇一所文法学校中十多个工人阶级子弟——“家伙们”之上，对他们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民族志观察。他发现，“家伙们”在学校中形成了具有鲜明风格的反学校亚文化：他们逃课、打架，结成非正式群体；对学校 and 老师的权威带有根深蒂固的鄙视；并对那些循规蹈矩的“书呆子”加以鄙视和嘲笑。他进而发现，“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和工人阶级“苦中寻乐”的车间文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⁴“小子们”由此发展出一套非主流的生活态度，认同于一般性质的体力劳动。在毕业之后，他们往往选择进入工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子弟的“文化生产”推动了他们的“社会再生产”。将文化研究与劳工研究结合的《学做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学做工》体现了对底层文化生产的关注。在书中，保罗·威利斯并没有急于对“家伙们”看似“离经叛道”的反学校文化进行道德上的评判，而是对文化本身进行了细致与深入的描绘。探讨工人阶级社会再生产议题的时候，《学做工》并没有将来自底层工人阶级子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傀儡”，而是将他们视为积极、能动的文化创造者，关注和分析他们文化创造的过程和结果，从而揭示出社会生活再生产过程中复杂的、竞争的、动态的与充满活力的一面 (Willis,

1981)。这对于我们如今往往关注生产、抗争等政治经济议题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显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提醒我们关注到缺失的文化层面的议题。

第二,《学做工》的另一理论意义在于文化研究与社会议题的结合。在伯明翰学派的一系列作品中,《学做工》可谓“独树一帜”,这是因为《学做工》将对青年文化的解读与更为深刻的社会再生产的议题联系起来,揭示出青年文化生产本身蕴含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性。在文化研究日益“去阶级化”、“去政治化”的今天,《学做工》体现出的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对社会再生产议题的洞察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s)并以其作为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背景下,将对文化的描绘与社会再生产的关注相结合显然具有必要性。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文化研究不流于对现实的描述和符号文本的分析,更具有深入性。

三、《学做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小子们”到“杀马特”

虽然《学做工》以其对青年亚文化的细致描绘和深入洞察成为经典,并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做工》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问题的现成研究框架。自70年代之后,伴随着亚文化的碎片化和全球化,《学做工》在学理上所属的伯明翰学派的缺陷日益显露:例如对“亚文化”这一概念实体性的过度强调;在研究方法上对阶级因素的过度看重;在研究地域上局限于英国研究,而没有考虑到文化全球化的背景等(Bennet, Kahn-Harris, 2004)。同时,面临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与文化创造、人们认同塑造的深远转变,产生于“前网络时代”的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显然成为了“有缺陷”的理论模型(a flawed model),无法直接应用于网络时代的集体文化书写。这需要我们结合中国现实,对《学做工》理论的议题的应用进行今日再思。

在消费社会和网络社会崛起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中兴起了“杀马特”群体,与“小子们”类似,他们也发展出了具有鲜明风格的青年亚文化。“杀马特”一词源自英语单词“Smart”,有“时尚,时髦,聪明的”等意涵。在杀马特成员看来,“杀马特”是“集合欧美风尚、日韩视觉系”为一身的“非常非常时尚”的文化潮流。他们模仿欧美朋克与日韩视觉系文化,“爆炸”的发型,“韩版”(韩国版型)的服饰是他们的文化风格特征。他们的文化生产基于特定的城市空间:他们在地摊上购买衣物,在理发店设计发型,在网吧中上网交友。已有研究中发现杀马特成员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在城市打工,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张天潘, 2013)。然而,他们在网络中自称为“时尚达人”、“网络红人”,体现出一种新

的认同塑造。“杀马特”文化的出现彰显出新工人群体形塑自身认同的努力,也展现出了新工人群体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的亚文化生产也呈现出全球化的风格。

总而言之,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文化生产主体的崛起意味着我们继承《学做工》与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可能,但是地域、时代的变化又需要我们对《学做工》的理论进行必要的调整与突破。下文将以杀马特群体为例,探讨我们如何在研究对象、媒介环境与研究空间方面对《学做工》进行今日再思。

(一)、研究对象:从“小子们”到新生代农民工

在《学做工》所关注的60、70年代英国社会中,是工人阶级子弟选择继承父业,成为体力工人,从而完成了社会的再生产,并为资本主义生产着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在中国,与这一群体相对应的则是“杀马特”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外出选择打工,从而成为中国这座“世界工厂”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源。

首先,杀马特和小子们都是积极的文化生产者。“小子们”在学校中通过逃课、捣乱、调侃“书呆子”而形成了一种风格鲜明的“反学校文化”。杀马特群体通过夸张的发型、拼贴的服饰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如果说“小子们”追求的是一种自由、“哥们儿”义气的话,杀马特群体追求的则是时尚的风格与特立独行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杀马特”的文化生产让他们超越了现实中的新工人身份的框限,获得了认同形塑的更多可能。因此,《学做工》中对“小子们”细致的、深刻的文化分析也依然适用于对杀马特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考察之中。如果考虑到“小子们”和“杀马特”文化的社会阶层属性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都是一种工人群体的底层文化,都体现了底层青年对于自身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当然,在发现两者的内在相似性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杀马特”群体与“小子们”的深刻差异,这根源于他们所处群体的历史境况和社会背景。英国工人阶级是一个经历了长期的斗争过程,具有一定自觉性和阶级意识的阶级(汤普森,1963/2013)。中国新工人群体则面临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阶级意识则尚未形成的境况(蔡禾等,2009;卢晖临,潘毅,2014),他们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整个生活方式”。因此,不同于“小子们”能够从父辈继承比较完整的工人阶级的思想经验、生活方式;“杀马特”的文化生产受到其父辈的影响,但他们与父辈之间的文化之间亦存在巨大的断裂;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产日益受到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深远影响,利用域外的文化资源,如“朋克”、“视觉系”等文化来塑造自我想象(阿尔君·阿帕杜莱,1996/2012)。《学做工》中,保

罗·威利斯关注的是“小子们”的文化生产与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的关联；对“杀马特”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我们的研究需要更广阔的视角，在关注到他们的文化与其父辈关系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和探讨这一群体的文化生产与全球文化之间的关联性。

（二）、媒介与空间：从校园空间到网络空间

“杀马特”群体与“小子们”相比，另一个显著特征在于杀马特群体主要以网络作为文化生产的空间；因此，这也需要我们对研究的空间转换有所关注。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互联网尚未兴起与普及，现实中面对面的文化共同体是青年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单位 (Willis, 1990)。因此，在《学做工》中，保罗·威利斯主要关注的是“小子们”的校园生活，运用了“文化民族志”的方法，以观察他们现实中的社会互动与文化塑造的过程作为研究的核心。然而，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与媒介环境的深刻转变，面对面的交往逐渐被网络在线互动所取代；曾经的“风格集群” (stylistic unity)、 “集体知识” (collective knowledge) 与“俱乐部场景” (club scene) 等概念已经不再适用 (Bennet, 2004)。“杀马特”文化的出现就体现出青年亚文化生产方式的深刻转变。

网络空间给了杀马特群体风格实践的更多可能。网络空间虽然并不以面对面的社会互动展开，但在人们的化身 (avatar) 的互动之下，依然具有一定实体性，也即“世界感” (a sense of worldness) (Taylor, Boellstorff, Nardi, Pearce, 2012)。“杀马特”群体可以通过网名的设定来拥有自身独特的身份；并通过QQ空间装扮，日志写作的形式进行个人表达。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普普通通的工人，但是当他们进入网络空间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杀马特时尚贵族”，并可以在特定的网络家族中担任“总创”、“高管”，虚拟社会赋予了他们一种新的身份。在工厂环境中受到严密的监视和规训的时候，网络空间对“杀马特”群体而言更具有了“逃离”的意义，让他们构筑了属于自身的文化世界，让自身的符号创造力 (symbolic creativity) (Willis, 1990) 得以应用和展现。因此，如果说“校园”构筑了《学做工》中“小子们”生活的核心场景的话，网络虚拟空间则成为“杀马特”文化生产的土壤。

研究空间的转变也意味着研究方法的转变。对“杀马特”这样主要以网络空间为文化生产空间的群体而言，已有的现实场景中的民族志方法就略显不足。例如，现实中的观察只能够发现这一群体的手机与电脑的使用，但是却无法深入到他们文化生产的内在内容，他们的具体文化生产依然是一种“黑箱”。因此，将民族志方

法转移到“虚拟空间”(Taylor, Boellstorff, Nardi, Pearce, 2012),应用一种“虚拟民族志”方法就成为应有之义。例如,“杀马特”群体文化生产的基本单位是以QQ群为基础的网络家族。因此,应用虚拟民族志方法,研究者以一种“虚拟个体”身份对“杀马特”群体的QQ群进行参与式观察,了解他们的网络社会互动的方式与内容,有利于揭示出他们具体的文化创造以及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的过程。这亦是对《学做工》中的文化民族志方法在网络时代的应用和拓展。

正如“杀马特”群体身上所体现的,网络媒介的兴起,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与交流手段,更从根本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情境”(cultural context),也需要我们对已有研究方法进行突破。然而,在媒介和空间转移之下,《学做工》的核心关切依然延续:从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中)的聊天、自我形象塑造等实践中,捕捉研究对象文化生产的鲜活信息,为进一步的文化解读与分析提供基础。

(三)、网吧研究——实证研究的切入点

前文中从研究对象、研究空间与研究方法的转变等维度探讨了对《学做工》的理论进行继承与突破的可能;也就是说,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变迁,我们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深刻的调整。那么,在实证研究层面,面对研究对象的转变与研究空间的转型,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找到怎样的突破点和切入点,对“杀马特”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进行考察呢?网吧民族志研究则成为经验研究层面的一种可能的切入点。

首先,在笔者的研究中,“网吧”在杀马特群体的文化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网吧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信息中下阶层”提供了相对廉价的互联网服务,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周葆华,吕舒宁,2011;黄伟迪,2011;邱林川,2013)。同时,网吧中的电脑设备是杀马特群体与虚拟世界相连的重要纽带。正是通过QQ、YY语音等网络社交软件,“杀马特”群体可以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因此,网吧民族志研究能够让我们发掘杀马特群体在虚拟空间中的文化生产,从而走出工厂民族志的盲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因此,网吧成为我们操练文化民族志方法的绝佳场所。

同时,在笔者的研究中,“杀马特”群体并非是在进入工厂之后才进入网吧上网,他们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就已是网吧的常客。⁵“去网吧,玩杀马特,玩劲舞团、LoL(网络游戏)”是他们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和学校禁止未成年进入网吧的背景下,“去网吧”让他们构筑出了一种具有反学校色彩的文化。也

正是在这样的网吧文化生产过程中，他们摒弃了学业，选择外出打工，进而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员，完成了社会再生产。网吧不仅是杀马特群体文化生产的场所，更是他们社会再生产的空间。“网吧”与《学做工》中的学校空间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由此，“网吧”，这一在“杀马特”群体的文化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又少有研究者密切关注的空间就成为我们继承和应用《学做工》理论的重要切入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实现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空间的转换，在研究的落脚点方面又实现了对《学做工》理论的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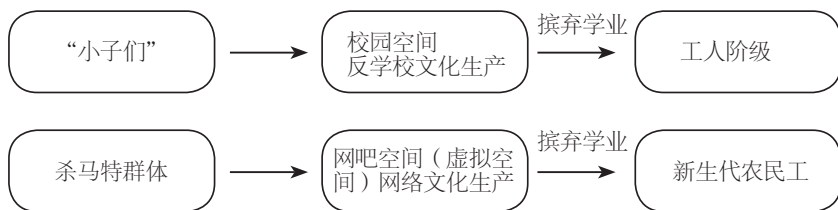


图1：学校、网吧文化生产的比较

当然，“杀马特”群体只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一群体折射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在文化生产方式、认同建构方面的深刻转变。通过对“杀马特”和“小子们”的比较，我们发现学做工的理论是可以应用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考察之中的；但是在继承《学做工》的理论之外，还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差异、研究空间与研究方法的转变有所关注。

四、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是转型中国的重要群体，他们为中国这一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源；“杀马特”群体的崛起告诉我们，在劳动、生产与抗争之外，他们也日益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他们的文化生产过程不仅体现出他们主体的复杂性；也隐含着这一群体社会再生产的线索。《学做工》启示我们将文化研究的视角、方法引入对劳工研究的探讨；从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产与抗争到这一群体的意义创造与文化生产，研究场所从学校、工厂转移到虚拟空间，通过“网吧民族志”等实证研究，揭示出这一群体的充满活力的维度，进而了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内在机制。

网络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的文化面貌，也为文化研究和劳工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在西方的文化研究日益碎片化、去阶级化和去政治化的今天，中国经验

显得尤为重要,将文化研究与劳工研究结合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不仅将成为应用《学做工》理论于中国实践的切入点;也将为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增添一种中国的维度;亦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转型中国。

激荡四十年,依旧“学做工”。(本文的写作受到Paul Willis、卢云峰、吴靖等老师的帮助,匿名审稿人也给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方惠)

注释 [Notes]

- 1 根据相关数据(国家统计局,2014),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达到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已经接近半数。
- 2 中国网络发展的具体数据,可以参见《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根据2014年7月份第34次报告: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8.2%,农村网民规模达1.78亿。可见,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比例而言,中国都已经成为一个网络大国和“网民大国”。
- 3 这本书于2013年翻译成中文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 4 事实上,保罗·威利斯自身就是一名工人阶级子弟,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有切身的理解。
- 5 根据中国政府相关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是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然而,在中国经常有一些未经政府许可的“黑网吧”存在,这些网吧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杀马特”群体在学生时代亦成为这些“黑网吧”的常客。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阿尔君·阿帕杜莱.(2012).《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原著出版于1996年).
- Arjun Appadurai.(2012).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Trans).*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6).
- 保罗·威利斯(2013).《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如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7年).
- Paul Willis. (2013).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class Kids Get Working-class Jobs? (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7).
- 蔡禾,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萧裕均(2009).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6),5-35.
- Cai He, Pan Yi, Lu Huilin, Yan Hairong, Chen Peihua, Xiao Yujun.(2009). Peasant-workers: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Open Times.* (6), 5-35.

- 高崇, 杨伯淑 (2013). 新生代农民工的同乡社会网络特征分析: 基于“SZ人在北京”QQ群组的虚拟民族志研究. *青年研究*, (4), 28-39.
- Gao Chong, Yang Boxv. The countryship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s peasant-workers. *Youth Studies*, (4), 28-39.
- 国家统计局. (2014年5月12日).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检索日期: 2015年1月8日, 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检索于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2014.5.12). 2013 *National Report on Peasant-work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 胡泳(2008). 《众声喧哗: 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Hu Yong (2008). *The Rising Cacophony: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Public Discussion in Internet Age*.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黄伟迪(2011). 新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生活——比亚迪工业园的民族志调查. 《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十期》, 111-127.
- Huang Weidi (2011). An Ethnologic Study on the Migrant Life of the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in BYD Industrial Park in Huizhou and Guangdong.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Vol: 10.111-127.
- 雷蒙德·威廉斯 (1991). 《文化与社会》. (吴松江、张文定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1958年).
- Raymond Williams. (1991).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8).
- 李婷婷.(2007). 《保罗·威利斯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北京.
- Li Tingting (2007). *Paul Willis and Britain Youth Subcultures Studies*. Master Thesi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 卢晖临, 潘毅 (2014).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社会》, 34(4), 1-24.
- Lu Huilin, Pan Yi (2014). Self-Identity, Emo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China. *Society*, 34(4), 1-24.
- 吕鹏.(2006). 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 《社会学研究》, (2), 230-242.
- Lv Peng (2006). Producing Underclas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nderclass——Notes on 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ur. *Sociology Studies*. (2), 230-242.
- 邱林川(2013).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 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Qiu Linchuan, (2013).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ing-Less in Urban China*.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沈原.(2006).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社会学研究, 21(2), 13-36.
- Shen Yuan. (2006).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king-class. *Sociological Studies*. 21 (2), 13-36.
- 汤普森P.E. (2013).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E.P. Thompson (201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ranslated by Qian Chengdan, etc) Nanjing: Yilin Pres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熊春文、史晓晰、王毅(2013). “义”的双重体验——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11(1), 43-62.
- Xiong Chunwen, Shi Xiaoxi, Wang Yi. (2013). The Double feelings of “Yi” ——The Group Culture of Peasant-workers and Its Social Meaning.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 11(1), 43-62.
- 杨国斌(2012). 《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 (邓燕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09年）.
- Yang Guobin. (2012).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Tran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9).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4).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34次).
- CNICC. (2014). *Report on China's Internet Development*.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4年7月4日). 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检索日期: 2014年1月8日, 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3/201407/171144.html.
-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7.4). *Report on Chines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3/201407/171144.html.
- 周葆华, 吕舒宁(2011). 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 《新闻大学》, (2), 145-150.
- Zhou Baohua, Lv Shuning. (2011). Investigation on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2), 145-150.
- 周潇(2011).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社会》, 31(5), 70-92.
- Zhou Xiao. (2011). Counter-School Cul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ds and Zidi.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1(5), 70-92.
- 张天潘.(2013). “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 南风窗, (4).
- Zhang Tianpan. (2013). Smart: A group of People that should be focused on. *South Reviews*, (4).
- Bennet, A. (2004). Virtual Subculture? Youth, Identity and the Internet. In A. Bennet, & K. Kahn-

- Harris (Eds.) *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ennet, A., & Kahn-Harris, K. (2004). Introduction. In A. Bennet, & K. Kahn-Harris (Eds.), *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all, S., & Jefferson, T.(Eds.) (200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Meng, Bingchun (2011). From Steamed Bun to Grass Mud Horse: E Gao as alternative political discourse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7(1): 33-51.
- Peng, Y. (2008). Internet Us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Know Techn Pol*, (21), 47-54.
- Taylor, T., Boellstorff, T., Nardi, B., & Pearce, C. (2012). *Ethnography and Virtual Worlds: A Handbook of Meth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llis, P. (1981). Cultural 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Re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Social Pre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Reproduction. *Interchange*, (12),, 48-67.